

鲁迅后期的斗争

浙江省萧山县革命委员会文教局编

一九七七年三月

毛主席语录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他学会了辩证法。

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么？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鲁迅后期的斗争》

目 录

毛主席语录

周总理论鲁迅…………… (1)

鲁迅后期的斗争概述……………王一桃 (4)

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

——学习鲁迅无限崇敬、无限热爱毛主席

(资料汇编)…………… (50)

鲁迅与秋收起义…………… (53)

关于三十年代文艺界路线斗争的一些回忆

——纪念鲁迅诞生九十五周年……………唐 弢 (58)

鲁迅与日本友人山本初枝……………李 菁 (66)

鲁迅说：“轻伤不下火线！”……………茅 盾 (76)

鲁迅痛打落水狗张春桥……………鲁迅研究室大批判组 (80)

附：狄克给鲁迅的黑信全文…………… (83)

江青三十年代的三次反革命表演……………鲁迅研究室 (85)

张春桥、姚文元为什么害怕鲁迅书信出版？…………… (90)

附：叛徒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 (摘要)…………… (91)

姚文元是反对鲁迅的急先锋

——评《鲁迅——文化革命的巨人》

……………广东鲁迅研究小组 (92)

周总理论鲁迅

《在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上》

在武汉当时，文艺性聚会似乎不多，或许也怕是我自己参加得太少，但有一次聚会我是参加了的，而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便是十月十九日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了。

.....

大家推我为主席，我自然讲了话。

周公（指周恩来同志——编者注）的话最为精采，他主要是强调着鲁迅的战斗精神。鲁迅一生是处在革命时代，特别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反动派的气焰异常嚣张，而鲁迅坚守革命阵地，不屈不挠地和恶势力搏斗，为新社会催生，一直战斗到底。鲁迅是最倔强的斗士，最慈爱的导师。我们纪念鲁迅，也就应该学习鲁迅这样的战斗精神。不仅限于文艺界，应该超出文艺界。特别在现在大敌当前的时候，我们要反对中途妥协，反对消极应付，反对第五纵队的出卖，反对个人主义的高蹈。“疾风知劲草”，我们在今天的“疾风”之中，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鲁迅一样的“劲草”。

（摘自郭沫若《洪波曲》。见《沫若文集》

（九）167—168页，标题是另加的）

《鲁迅的立场》

鲁迅先生死了十年了，整整的十年了。先生逝世后，中国就从内战进入抗战。然而十年后的今天，不幸抗战才告结束，又回到了内战。内战是鲁迅先生所诅咒的，抗战才是鲁迅先生所希望所称颂的。他所希望的事，总算在人民大众的努力之下实现了，而且取得了胜利。而现在他的祖国却还有着内战，这应该是我们参加这会的每个人所感到难过的。多少年来，全国人民个个祈求民主、独立、团结、统一，日本投降已经一年多了，这一个愿望还没有能达到，怎么能叫人不失望、不悲痛？

鲁迅先生逝世那年，国内就已经进行谈判，到今天足足谈了十年了，还不能为人民谈出一点和平来。我个人对此更有说不出的难过。

但是人民既然一致的有了这个要求，只要能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和平民主统一争取到的。今天我要在鲁迅先生遗像面前，在各位人民的面前，说明我们的信念和努力：我们决不放弃和平统一谈判，即使被逼得为自卫而反抗，也仍要为求得和平统一而努力，我今天就这样的郑重作这个誓言。

鲁迅先生曾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里就说出了鲁迅先生的方向，也即是鲁迅先生的立场。鲁迅先生最痛恨的是反动派，对于反动派即所谓之“千夫所指”，我们是只有“横眉冷对”的，不怕的，我们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可是对于人民，我们就要如对孺子一样的为他们做牛，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的为人民服务。过去历史上有

多多少少的暴君、独裁者，结果都一个个的倒下去了，为后世所唾骂；但是历史上的多多少少奴隶、被压迫者的农民，还是牢牢的站住的，而且长大下去。现在是人民的世纪，一切由人民决定，一切都为人民，所以我们应该站在鲁迅所站的立场，朝着鲁迅所走的方向，象牛一样的为人民去努力奋斗。鲁迅，闻一多都是最忠实、最努力的牛，我们要学他们的榜，在人民面前发誓：做人民的奴隶，受人民的指挥，做一条牛。

（原编者按：“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逝世十周年，其时国内政治谈判正甚紧张，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代表团及各方代表皆齐集上海，这天上海文化界举行纪念大会，规模较历年盛大，周恩来于百忙中抽暇参加，发表简单的演说，公开在群众面前作了严正表示，讲词见此日的《文汇报》，深为全国重视。此处题目为编者所加，本稿为纪录者纪录大意，未经周氏改定。”此次排印，是从影印件上抄下来的。）

《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的题词》

鲁迅先生之伟大，在于一贯的为真理正义而倔强奋斗，至死不屈，并在于从其艰险困难的处境中，预见与确信有光明的将来。这种伟大，是我们今日坚持长期抗战，坚信最后胜利所必须发扬的民族精神！

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

周恩来

（引自1977年1月5日《长江日报》吴翰闻《江河万古流 业绩代代传》一文）

鲁迅后期斗争概述

王 一 桃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指出：“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五四”以来，鲁迅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力量一边，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及其走狗文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鲁迅在极其尖锐残酷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自觉执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机会主义文艺路线，终于把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打得一败涂地，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作为无产阶级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在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机会主义文艺路线的长期斗争中，积累了极其宝贵的斗争经验。他后期写的许许多多深刻有力的杂文就是在文化战线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斗争的经验总结。

鲁迅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全面地、深刻地批判“新月派”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这在我国现代文艺思想战线上还

是第一次；鲁迅代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同周扬一伙“左”右倾机会主义文艺路线作斗争，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学习鲁迅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机会主义文艺路线斗争的经验，对我们当前深入开展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肃清他们在文艺战线上散布的流毒，把无产阶级文艺革命进行到底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鲁迅同资产阶级反动文艺思想的斗争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这一历史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新民主主义论》）。在这一时期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结成反革命同盟，他们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对内则残酷地剥削压迫人民，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在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反革命军事“围剿”的同时，发动了疯狂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在一九三〇年冬到一九三一年春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中，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上出动了十万兵力，在文化上继颁布“著作权法”、“宣传品审查条例”之后又颁布“出版法”，规定凡“宣传共产主义及阶级斗争”者均在“查禁”、“究办”之列。在一九三一年三月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中，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上出动了二十万兵力，任命何应钦为总司令，在文化上公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对进步书报的压迫、限制更严。在一九三一年七月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中，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上出动三十万兵力，由蒋介石亲自出马，任“围剿”总司令，还请德、日、英顾问参与“围剿”，在文化上公布“出

版法施行细则二十五条”，查禁进步书刊二百二十八种。在一九三二年六月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中，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上出动五十万兵力，在文化上公布“宣传品审查标准”，规定凡宣传共产主义者均为“反动”，凡批评国民党不抵抗政策，要求抗日救国者均为“危害中华民国”，“一律禁止，以免流毒”。次年又发布“查禁普罗文艺密令”。在一九三四年二月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中，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上更是变本加厉，倾巢出动。在文化上公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规定排版前须交伪中宣委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删改，仅在这一年，就查禁进步文艺书籍一百四十九种。在反革命文化“围剿”中，他们除了实行武力镇压（封闭、捣毁进步书店，通缉、逮捕革命文化工作者，秘密杀害革命作家）外，还指使他们豢养的走狗文人，打着各种旗号，向无产阶级文艺发动一次又一次的猖狂进攻。作为无产阶级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带领广大革命文艺战士，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武器，先后同“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自由人”、“第三种人”等资产阶级反动文人及其反动思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终于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正如毛主席后来提到的，“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么？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新民主主义论》）

必须指出的是，这些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流派实际上都是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武器。鲁迅当时就尖锐指出：“他们所谓‘文艺家’的许多人，是一向在尽

‘宠犬’的职分的，虽然所标的口号，种种不同，……但这仅如巡警手里拿着前膛枪或后膛枪，来福枪，毛瑟枪的不同，那终极的目的却只一个：就是打死反帝国主义即反政府，亦即‘反革命’或仅有些不平的人民。”（《“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其中象“民族主义文学”本身就是国民党官办的法西斯文学团体，其成员无一不是张牙舞爪的“剿共”的鹰犬。至于象“新月派”、“第三种人”等“虽然所标的口号，种种不同”，但“终极的目的”却是一致的，他们都“在尽‘宠犬’的职分”，实际上也是“剿共”的鹰犬，只是挂的招牌不同而已。由此可知，以鲁迅为旗手的无产阶级文化新军同他们的斗争，实质上是文艺战线上两个阶级、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整个文化战线上反“围剿”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鲁迅对“新月派”的斗争

首先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进攻的是国民党反动派走狗文人集团“新月派”。鲁迅对“新月派”的斗争，是他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文化“围剿”的辉煌的第一仗。

“新月派”是最早充当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急先锋，主要成员除原“现代评论派”胡适、徐志摩、陈西滢外，还加上梁实秋、叶公超、沈从文、罗隆基、陈梦家、饶孟侃、潘光旦、陈禹九等辈。他们大多是依附于买办资产阶级的。新月社的成立可以追溯到一九二三年，它和现代评论社是两块招牌，一家黑店。到一九二七年北洋军阀政府土崩瓦解，他们预感到旧主子没落，立即摇身一变，

由北洋军阀的帮凶变成蒋家王朝的走狗。一九二八年三月，《新月》月刊创刊，为了抵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广泛传播反对无产阶级文学，徐志摩在《新月》发刊词上首，先发动了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挑战。他大肆攻击所谓“攻击派”、“偏激派”、“热狂派”、“稗贩派”、“标语派”、“主义派”等，把矛头集中指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他公开标榜所谓“健康”和“尊严”，强调所谓“纪律”和“规范”，很明显，这是在为蒋介石献谋划策，敦促国民党反动派当局“铲除”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在政治上、文化上加强法西斯专政。

随后，“新月派”同人连篇累牍地在《新月》这个反动阵地上发表反共、反马克思主义、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文章，其中梁实秋的《文学批评辨》、《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和《论鲁迅先生的“硬译”》，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鼓吹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攻击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作。在这些反动代表作中，梁实秋胡说什么人没有阶级性，只有共同的人性；“文学家的心目中并不含有固定的阶级观念，更不含有为某一阶级谋利益的成见”，宣扬“文学一概都是以人性为本，绝无阶级的区别”，“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鼓吹“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的标准”，恶毒攻击无产阶级“错误在把阶级的束缚加于文学上面”，胡说什么“以文学为革命的工具，那便是小看了文学的价值”。此外，梁实秋还别有用心地攻击鲁迅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诬蔑鲁迅的这些译著为“死译”，“读起来比天书还难”。总之，梁实秋否定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反对文艺作为阶级斗争的

武器，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文艺创作。

鲁迅针对“新月派”这些谬论，进行了全面、深刻、彻底的批判。一九二七年年底，鲁迅写了《文学和出汗》一文，揭穿了梁实秋所鼓吹的人性论的阶级实质。鲁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人类和文学发展的历史说明，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就不存在什么永久不变的抽象的人性，也不存在什么指导永久不变的人性的文学。针对梁实秋在《文学批评辩》提出的“普遍的人性是一切伟大的作品之基础”的反动观点，鲁迅用生动的常见事例来反驳：“譬如出汗罢，我想，似乎于古有之，于今也有，将来一定暂时也还有，该可以算得较为‘永久不变的人性’了。然而‘弱不禁风’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例如英国，那小说，先前是大抵写给太太小姐们看的，其中自然是香汗多；到十九世纪后半，受了俄国文学的影响，就很有些臭汗气了。”这就是说，同样是出汗，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就不一样；同样是文学作品，资产阶级的作品和无产阶级的作品也就不一样。两者之间，根本都不见得有什么“永久不变的人性”。一九三〇年三月一日，鲁迅发表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表示自己学习、掌握、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坚强决心，进一步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有力地批判了超阶级的人性论的虚伪。

梁实秋一伙所宣扬的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虽经鲁迅用马克思主义戳穿，但是，梁实秋们并不因此认输，继续胡说什么资本家和劳动者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惧的情

绪，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而“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人性的艺术”，对此，鲁迅用生动而浅显的典型事例，进一步阐明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的思想感情都是为他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阶级）所决定的，比如说：“喜怒哀乐，人之情也”，似乎人所共有的。“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拣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在此，鲁迅进一步说明，既然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人性，也就没有超阶级的文学，“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在这基础上，鲁迅明确指出文学是阶级斗争的武器，他说，梁实秋的那些谬论“原意是在取消文学上的阶级性，张扬真理的。但以资产阶级为文明的祖宗，指穷人为劣败的渣滓，只要一瞥，就知道是资产家的斗争的武器”。他还旗帜鲜明地提出：无产阶级文学事业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倘说，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以表现人性为限，那么，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

鲁迅还进一步用马克思主义的显微镜揭露梁实秋们的反动性和欺骗性。鲁迅尖锐指出，梁实秋借反对“硬译”为名，实际上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梁实秋鼓吹的“创作自由”，实际上是只给资产阶级自由，不给无产阶级自由。梁实秋宣扬的“阶级调和”、“劳资合作”，

实际上是欺骗无产阶级，诱使他们放弃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凡此种种，都说明了梁实秋们是在为其主子效劳。

当梁实秋遭到鲁迅的致命反击之后，就赶紧声明自己不是资本家的走狗。他既狼狈又无赖地说：“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能得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资本家的走狗》）鲁迅针对他的狂吠，形象地勾画出他“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本相：“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指出：“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资本家的证据。”同时还针对他想反咬人一口，想暗示反动当局将人捕杀，也就是“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指出这正是他们理论上极端贫乏无力，经不起人们一驳，“所以从‘文艺批评’方面看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这“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比起‘刽子手’来，也就更下贱。”

其实，“新月派”早就奉了主子蒋介石的意旨，发表罗隆基的《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对国民党进行小批评，大帮忙。胡适还专门写信给蒋介石的心腹陈布雷，托他将《新月》杂志转赠给蒋介石，信中这样说：“托井羊先生带上《新月》二卷全部及三卷已出版之三期，各两份，一份赠与先生，一份请先生转赠介石先生，……甚盼先生们能腾出一部分时间，稍稍流览这几期的言论。”这几期言论中，就有胡适自己写的咒骂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斗争、宣扬“五鬼（即贫穷、疾病、愚昧、贪

污、扰乱）闹中华”、鼓吹“好政府主义”等各种反动文章，由此终于得到蒋介石的垂询。此后，“新月派”更加起劲地为国民党反动派出谋献策。罗隆基在《论中国的共产》一文中提出军事“围剿”之外，还要辅以思想“围剿”，以铲除共产主义思想。梁实秋大肆鼓吹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妄图消除人民“争斗的欲望”，也就是这样的货色。他们正是彻头彻尾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系统地贩卖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就是梁实秋之流的“新月派”，因此，鲁迅同“新月派”的斗争，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同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的一次重大的论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艺思想战线上的一次激烈的交锋。毛主席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到“象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在这里，毛主席充分肯定了鲁迅对“新月派”梁实秋一类斗争的历史功绩。鲁迅不仅对“新月派”的反动文艺理论基础人性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而且还对“新月派”为其主子国民党反动派尽“宠犬”职分的本质作了无情的揭露，指出他们的创作“和不创作是很少区别的”。事实也正是这样。“新月派”在创作上根本拿不出什么象样的货色。徐志摩的诗充满了“人性论”的梦呓和神秘、颓废、虚无的色彩。在《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云游》、《列宁忌日——谈革命》、《秋虫》中，作者抒发的正是买办资产阶级反动没落的思想情绪：他“辞别了人间”、“脱离了这世界”，“去到那理想的天庭”，然而仍离不开人世；他胡说“俄国革命是人类史上

最惨刻苦痛的事实”；攻击中国革命是“在幻想中想望一个永不可能的境界”。沈从文的小说《边城》、《丈夫》也和《杨妃出浴图》、《岁寒三友图》一样无聊，纯粹是低级下流、迎合资产阶级胃口的东西。这就从文艺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上彻底缴了“新月派”的械，彻底暴露其“挥泪以维持治安”的“刽子手和皂隶”的本相。不出鲁迅所料，“新月派”的干将后来都纷纷撕下伪装“爬了上去，和月亮距离远起来了。”他们“常发谬论”，“和官僚一鼻孔出气”，再也“无人信之”。至此，“新月派”已溃不成军，《新月》出到四卷七期，也就奄奄一息了。

(二)鲁迅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斗争

继国民党反动派走狗文人集团“新月派”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进攻的，是国民党官办法西斯文学团体“民族主义文学”。鲁迅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斗争，是他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文化“围剿”的重大回合。

“民族主义文学”是以国民党党棍、特务为核心的反动文人为了取代已经溃败的“新月派”，直接充当反革命“围剿”的马前卒而拼凑成的法西斯文学团体。它是由CC特务头子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亲手策划出来的。主要干将有潘公展、王平陵、朱应鹏、范争波、傅彦长、黄震遐、邵洵美。鲁迅在《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一文中所指出的“这些‘文艺’的主持者，乃是一位上海市的政府委员和一位警备司令部的侦缉队长”。前者就是朱应鹏（他还兼任伪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后者就是范争波（他还兼任伪松沪警备司

令部军法处长)。其他如潘公展是CC特务头目、伪上海市政府委员兼教育局长，王平陵、傅彦长都是国民党特务，黄震遐既是国民党特务，又是国民党军官。他们之中，连一个起草“民族主义文学”的宣言的人也是找不到，以至不得不以重金雇用别人代写。在他们授意别人炮制的毒草中，他们以国民党反动派直接发言人的姿态出现，胡说什么“阶级意识在中国，可以说，是陷于民族灭亡的窞井”（朱大心：《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使命》），而要“突破”这个所谓“当前的危机底唯一方法”，就要以“民族主义”为“中心意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而所谓“民族主义”的“中心意识”即是要恢复和加强“传统的”、“固有的道德”，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其实质是对外媚日求生，出卖民族利益，对内反共反人民，搞法西斯一党主义。为此他们公开叫嚣“民族主义运动”“在政治方面”是“消灭”“中国共产党”，“民族主义文学”的“使命”是“排除”无产阶级文学运动。

关于“民族主义文学”出现的背景，鲁迅有一段精辟的论述。鲁迅说：“先前的有些所谓文艺家，本未尝没有半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觉得自身的溃败”，“一到旧社会的崩溃愈加分明，阶级的斗争愈锋利的时候，他们也就看见了自己的死敌，将创造新的文化，一扫旧来的污秽的无产阶级，并且觉到了自己就是这污秽，将与在上的统治者同其命运，于是就必然漂集于为帝国主义所宰制的民族中的顺民所竖起的‘民族主义文学’的旗帜之下，来和主人一同做一回最后的挣扎了。”这同毛主席对这一时期的阶级斗争的分析是一致的。正是由于革命的深入，引起反革命的极大恐慌，加紧了